

谁是全球化的推动者？ ——KOF 全球化指数的分析

王金良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 上海 201620)

摘要: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和标志。然而,关于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即谁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受益者或受损者等问题,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这些问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智库以及学者发布了一系列测量指数和报告,其中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KOF)发布的全球化指数具有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对KOF全球化指数的指标构建、数据来源、权重设定、计算方法及优缺点进行全面分析,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排名中较高的是西欧北欧国家,但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国是美国和中国等国。在对KOF全球化指数进行理论分析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全球化仍然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从规范意义上说,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秩序是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秩序推进其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

关键词:全球化; KOF 全球化指数;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 D5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17)04-0167-08

DOI: 10.16501/j.cnki.50-1019/d.2017.04.022

1 主要的全球化指数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改变当代人类社会的重要进程。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全球化”来描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现象和问题,但对这一概念存在许多误解和偏差,难以形成有意义的分析和对话。一般来说,人们通常把全球化与国际化、自由化、西方化或美国化混淆使用,从而造成了学术讨论和理论分析的困扰。具体来说,国际化指的是跨越国界的世界性市场,使得生产、销售、投资和金融等行为逐渐实现全球自由流动,主要描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而自由化指的是一种欧美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要求主权国家解除管制以减少或消除贸易壁垒的理念和主张。从文化层面来说,西方化或美国化主要描述的是欧美现代价值观的推行过程,是欧美国家政治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经济理念向全球推广和扩展的结果^{[1]276}。

应该说,全球化具有国际化、自由化、西方化、美国化以及现代化等概念的部分意涵,但全球化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内涵,后面几个概念不能完全取而代之。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化的和密集的跨国界交往和联系,是一种跨越地域和时间限制的网络关系。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过程,是一个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冲突的过程,也是一个观念更新和范式转变的过程^[2]。如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安排的地理限制逐步消解的社会进程,人们也意识到了这种发展趋势^{[3]3}。扬·斯科尔特(Jan Scholte)从社会关系层面进行了定义,认为全球化指的是超越了地理空间的跨地域联系^{[4]59}。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也把全球化视为

收稿日期: 2017-05-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研究”(16ZDA095),项目负责人: 蔡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治理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研究”(13CGJ021),项目负责人: 王金良; “华东政法大学高峰高原以外学科骨干专项资助计划经费”(A-9131-17-00148),项目负责人: 王金良。

作者简介: 王金良(1980—),男,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

一个地域和时间的压缩,即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即时性和共享性的单位。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的是世界的压缩,也指的是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5]11}。因此,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冲突的过程,人们对这一现象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国家尤其是欧美强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也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解国家”的过程,它会重塑国家的自主性并最终带来国家的消亡。概而言之,这些争议主要集中于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如何?谁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谁又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对于上述问题,世界银行以及国外一些大学和智库机构进行了研究和评估。这些评估机构建构了复杂的指标体系,借助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中以指数形式进行评估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在全球化指数评估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2001年由美国A.T.卡尼(A.T.Kearney)公司与著名的国际时事杂志《外交政策》联合发布的全球化指数;二是2001年由英国的世界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化指数;三是本文重点分析的KOF全球化指数,该指数是由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Konjunkturforschungsstelle/KOF)的简·斯图姆(Jan Sturm)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发布的,在全球化测量方面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银行和一些智库机构也在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进行了相关研究。2002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化、增长与贫穷——建设全球的世界经济》的报告,将中国和印度等24个国家划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而将许多非洲国家和一些前苏联国家划为“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2016年,贝塔斯曼基金会资助的“全球经济动力”也发布了一份题为《全球化报告2016:谁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报告。基于对1990年至2014年间全球42个发达国家和最重要的新兴国家的量化分析,该报告对哪些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以及受益的程度进行了测量。该报告重点分析了1995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出口和全球市场份额的变化状况,通过这种连续性市场份额的分析,揭示了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竞争力的差异及其原因。

在A.T.卡尼公司和《外交政策》联合发布的全球化指数中,共选取了经济整合、人员联系、技术联通以及政治参与4个一级指标。其中经济整合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证券组合投资以及投资收益等指标;而人际交往包括国际旅行、国际电话使用率、个人收益转移支付等指标;技术联系包括互联网用户数量、互联网主机数量、安全服务器数量等指标;政治参与主要包括每个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人力财力支出、签署的多边国际公约以及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等指标。在这一全球化指数中,对于全球化的测量偏重于经济贸易以及由高科技带来的高密度的、高频率的以及广泛的跨国交往。然而,这一全球化指数只是呈现了2001年至2007年每年度的排名结果,我们无法获得原始数据、指标权重设定以及计算方法,因此我们无法进行全面的评价。

KOF是一家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机构,也是全球著名的智库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定期的经济调查和评估。在报告中,KOF全球化指数对全球化进行了严格的定义。阿克塞尔·德雷尔(Axel Dreher)的定义比较新颖,他把全球化定义为某些行业生产率较低的国家追赶生产率较高的国家的过程,主要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测量^[6]。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即通过人员、信息、资金、财物、原材料和思想等跨大洲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络^{[7]86-108}。另一位学者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认为,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资本、商品、人员和观念的跨国界流动,是一个国界不断受到侵蚀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文化、技术和治理逐渐相互依赖的过程^{[8]155-177}。参考了上述几位学者的定义之后,KOF对全球化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认为全球化是创造跨大洲联系网络的一种进程,是人员、信息、观念、资本和商品全球流动的媒介。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全球化描述的是国界的侵蚀,以及国家间经济、文化、技术、治理以及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整合过程。

2 “全球化”指数的指标构建和方法

2.1 指标、变量和数据

指数评价体系是一种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适用于系统全面地测量社会经济现象。通常情况下,这

种测量是由多个相互具有可比性、科学性以及可操作性的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KOF 全球化指数由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 3 个

表 1 2017 年度 KOF 全球化指数

经济全球化	实际流动	贸易(占 GDP 比)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占 GDP 比) 证券投资(占 GDP 比) 外资投资所得(占 GDP 比)
	限制	隐性的进口壁垒 平均关税率 国际贸易税 资本账户限制
社会全球化	人员交流数据	国际电话通话量 转移支付(占 GDP 比) 国际游客量 外国人口数量(占一国总人口比) 国际邮件量
	信息流动数据	Internet 用户(每千人) 电视用户(每千人) 报纸进出口销售(占 GDP 比)
	文化接近性数据	人均麦当劳店数 人均宜家店数 书籍销售(占 GDP 比)
政治全球化		大使馆数量 参加国际组织数量 参与联合国安理会行动 签署国际条约数量

资料来源: <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一级指标分别按不同的权重加权平均得到,某一国家的分值越高,表明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主要测量的是跨国贸易、资本、服务以及市场交换的流通;社会全球化测量的是国家的思想、观念、信息和人员交流的程度;政治全球化测量的是政府政策的跨国扩散和影响程度。其中,每个一级指标的重要性不同,这些指标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权数。通过加权计算,指标的完成值除以指标的标准值,乘以每个指标的权数,再经过加总后除以总权数,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年度的测量中指标权重是不同的。

在 2017 年度 KOF 全球化指数中,经济全球化的权重是 36%,社会全球化的权重是 37%,政治全球化的权重为 27%。在 2017 年度全球化指数中,KOF 使用了更多原来无法获得的数据。这次指数发布对原来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和更新,共包括 3

个一级指标、23 个二级指标。其中,经济全球化的限制性指标中增加了 1 个二级指标即国际贸易税;在社会全球化指标中增加了 1 个二级指标即转移支付(占 GDP 比)。同时,为了更精确地进行测量,在修正中该指标还考虑到了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全球化,即基于全球化事实的测量,以及基于推进全球化政策的测量。KOF 全球化指数使用的大多数数据是客观数据,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罗巴年鉴、中情局世界各国年鉴等,详见表 1。

2.2 分析方法的选择

在 KOF 全球化指数中,最终得分采用了百分制计分方法。其中 1 是最低值,而 100 是最高值。截至目前,该指数评估的时间从 1970 年到 2017 年,评估对象涵盖了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其网络数据库中,可以查询到 1970 年以来所有被测量国家的数据和资料。经过数据标准化计算,每个原始指标的得分范围在 0 到 10 之间。每个国家在某项指标上分值越高,表明其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当然,根据指标数值高低与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关系,计算指标得分的公式有两种。当原始数据大小与全球化程度正相关时,其计算公式为: $(V_i - V_{min}) / (V_{max} - V_{min}) * 10$; 相反,当原始数据大小与全球化程度负相关时,其计算公式为: $(V_{max} - V_i) / (V_{max} - V_{min}) * 10$ 。这些指标的得分通过公式计算得出,原始数据越高,指标得分越高,该指标所体现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其中, V_i 代表的是第 i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V_{max} 代表的是与所有国家在基准年(2000 年)第 i 指标相对应原始数据中数值最大的一个值, V_{min} 则是最小的一个值。

在考察多个次级变量的权重时, KOF 全球化指数使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其结果是对原数据中的方差

做出解释。通过考察每年度所有样本国家的数据,通过计算可以确定每个次级指标的权重。使用这一方法,可以对次级指标中每个变量的方差进行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大小在0和1之间,所有指标的权重之和为1。由于原有指标可以用主成分来代替,指标系数可以看成是主成分方差贡献率。每个变量的方差贡献率越大则说明该主成分的重要性越强,其权重也越强。当然,这一计算方法也可以推算出全球化指数一级指标的权重。在全球化指数测量中,以2000年为基准年,然后对这一年的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在数据缺失时,可以对其权重进行调整以使误差达到最小。通过数据的回溯计算,最终可以得到自1971年以来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指数得分情况。

3 全球化指数的分析及其意义

3.1 优点和偏差

任何指标都是为了对研究对象进行更好的测量,这就要求指标建构符合目的性、理论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对国家全球化程度的测量,无疑是一个难题。无论是何种测量指数体系,我们只能选取某些重要指标,不能完全精确地反映测量对象的全部属性。同样是对国家全球化的程度进行测量,A.T.卡尼与《外交政策》杂志发布的全球化指数,世界市场研究中心的全球化指数,KOF全球化指数,世界银行以及全球经济动力等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自己的指标体系和测量方法,其排名结果也大相径庭。根据A.T.卡尼与《外交政策》2007年度的全球化指数排名,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有新加坡、荷兰、爱尔兰、丹麦、美国、加拿大、约旦和爱沙尼亚等国家和地区^[9]。而在KOF全球化指数同年度的测量中,只有荷兰和加拿大两个国家的排名位于前10位之中。指标设定都是有选择性的主观结果,每个指数只是反映了研究者所认为的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全球化指数可以作为观察国家全球化程度的重要参考,但不能提供完全精确和客观的测量。

在KOF全球化指数中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两个一级指标中,有意无意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这无疑压低了非西方国家的排名,忽视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KOF中的指标设定基本上源于西方智库学者的定性判断,是基于新自由主义意识、生产方式及其制度设计的。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限制性指标方面,主要包括关税壁垒、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和资本账户限制等指标。实际上,这些非关税措施可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出口,反倒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产业的重要手段。显然对于这些所谓的“限制性”指标,应该做出严谨的判断。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某些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必要的保护性措施,也是这些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保障。对于这些保护政策,在测量中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将其当成全球化的限制性指标。在全球化指数评估中,国际电话通话量、转移支付、国际邮件量、报纸进出口销售、每千人电视用户和Internet用户数都是重要指标。这些指标建立在技术尤其是网络计算机等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是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在与发达国家竞争时,受制于人力资源素质、资本存量、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3.2 排名及其意义

在2017年KOF全球化指数排名中,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丹麦、瑞典、英国、法国和匈牙利,其中前4名的国家所得分数都超过了90分。不难发现,前10位的国家大都是西欧和北欧国家。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西欧和北欧国家已经普遍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测量中,这些国家的得分具有较大的优势。其原因是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同属于欧盟。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成员国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形成了一个相互融通的统一市场。在经济全球化限制性指标如隐性的进口壁垒、平均关税、国际贸易税以及资本账户限制等方面,这些国家的得分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的实际流动方面,这些国家也能够得到相对较高的分数。同时,大多数西欧北欧国家缺乏自然资源,国内市场狭小有限,购买力相对不足。西欧北欧国家基本上都

采用了对外开放和吸引投资的政策,大力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欧盟内部,西欧北欧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非常高,经济全球化是这些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全球化指数排名中,荷兰成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荷兰在经济全球化一级指标的得分是93.06分,排列在第4位,在经济全球化限制性指标如隐性的进口壁垒、平均关税税率、国际贸易税和资本账户限制方面,荷兰的得分较高。荷兰社会全球化中的得分是90.71分,排名也是第4位。荷兰在社会全球化中的信息流动数据和文化接近性数据方面,荷兰的表现也很突出。荷兰在政治全球化中的得分是95.41分,排列在第5位。在政治全球化测量的得分较高,使得让荷兰在综合排名中成为第1名。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两项指标上均排在第一位,但其政治全球化的得分只有54.77分,列在第134位,这使其总排名仅仅居于第20位。

在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指数测量时,难以解决强度相对指标和总量指标之间的矛盾。在2017年度KOF全球化指数评估中,世界人口大国中国排名第71位、巴西排名第73位、印尼排名第82位、印度排名第107位、巴基斯坦排名第113位、尼日利亚排名第118位以及孟加拉国排名第161位。在世界人口前10位的国家中,除了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全球化指数排名中分列第27位、第39位和第48位之外,其他国家的排名都在70位之外。不足为奇的是,在全球化指数排名前5位国家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总人口大约有5000万,而仅在中国就有10个省份的人口超过这一数字。同样,这5个国家的总面积大约为26.9万平方公里,中国省市自治区面积排名第8位的云南省的面积大约有38.3万平方公里,远超这5个国家的面积总和。尽管从统计学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和面积与其全球化程度并不直接相关,但在全球化指数的三级指标中,无论是每千人数、占一国总人口比以及占GDP比等统计指标与一国的人口、大小和经济规模直接相关。在全球化指数测量中,无论使用相对指标还是总量指标,小国都具有某种天然的优势。

美国是当代全球化的发动机。然而,根据KOF全球化指数的测量,美国的全球化程度并不高。在全球化指数排名中,美国的得分是79.73分,总排名居于27位。其中,经济全球化的分项得分是71.58分,排名54位;社会全球化的分项得分是78.82分,排名30位;政治全球化的分项得分是91.43分,排名19位。在全球化指数中的排名并不高,这仅仅说明作为一个大国美国的全球化程度不及西欧北欧国家,但不能反映美国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二战之后,美国的政治军事实力超群,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在美国等国家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机构和组织逐步形成。在建立多边规则、制度、开放市场和地区伙伴关系方面美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多边规则和机制也巩固了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美国用权力创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经济,反过来这一经济体系也有益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10]36-38}。封闭性和竞争性的地区集团并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的经济大国地位依赖于全球化带来的开放经济。正是这些原因,使得美国积极推动市场开放和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政策。而且,在推动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美国也直接地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在KOF全球化指数2017年度排名中,中国的排名是第71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8%左右,在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居于第2位。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GDP达7441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需要强调的是,直到20世纪末期,中国并不完全追求外向型经济战略,而是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是一种发展型国家的模式。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才从真正意义上加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之中。自此,中国政府加快了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对内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和放开外贸经营权,为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做好了准备。2015年,“中国WTO保护期”结束,中国进一步削减关税并开放农产品、零售和汽车等市场。目前,尽管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为维护世界经济平稳,为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13年,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改革开放铸辉煌 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报告中,指出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同时2017年1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认为2017—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因素就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持续政策刺激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并没有像悲观者预测的那样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反而随着综合国力进一步上升,中国正在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当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能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机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将得到更多国家的承认与追随,这将推动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和国际公共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11]。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为世界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做出了贡献,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因此而受益。

KOF全球化指数提供了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的排名,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政治制度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使得这一排名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排名仅仅是某个国家全球化程度的参考,并不能说明谁是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更不能解释哪些国家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或受损者。

4 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

4.1 全球化的推动力

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是对全球化形成和发展的经典论断和描述。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向世界扩展的结果。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地开拓市场,并且把这种生产方式传播到全世界。马克思早已预见到,资本必然会通过市场征服整个地球。“资产阶级,由于开掘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2]276}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国家排除一切妨碍资本主义生产的障碍。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过程,是以资本扩张为动力的。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推动了公司需求全球市场;二是超地域性结算为公司寻求利润最大化提供了条件;三是全球采购为巨额资本提供了更多选择;四是全球通讯和全球金融是生产和制造业全球化的巨大动力^{[13]104-107}。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和吉斯·佩吉尔(Kees Pijl)认为,由于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使得资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统治资源和权力^{[14]118-133}。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过程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在成为新的世界性统治阶级,其政治统治形式就是跨国国家^{[15]48-68}。事实上,尽管新兴国家的实力正在上升,但当前全球化仍然是由欧美资本主义强国所主导的,是一个不平衡的全球化。

4.2 不平衡的全球化

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化看做是单一经济维度的,或者简化为特定的经济过程,但经济指标是最显著的标准。从经济交往的角度来说,公元1500年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时间点,由欧洲强国引领的大航海时代是全球化交往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外,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这一时间大概是公元17世纪之后。关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阶段,当代一些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和传媒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末期看做是全球化的开端,这是全球价值链形成和交流强化的时期^[16]。全球化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具有崭新的特征^[17]。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后初步形成,这一进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18]18}。总体来看,当代的全球化具有迅捷而低成本的交通和通讯的基础设施,具有制度化和分层化的典型特征,而且具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当前的全球化不同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全球化,由于通讯、交通技术带来的变革,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为迅捷和方便,而且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成本更为低廉,这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相反,在以往历史时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群能够参与到全球化的交往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全球化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历史阶段的现象。

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同义词。他们普遍认为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将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带来全球经济的普遍增长^{[19]6-18}。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疲态,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发展困境和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成为这些国家寻求走出经济严重衰退、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的良方^{[20]100-133}。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改善了性别平等和人权状况。全球化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发展问题。对于全球化是否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英国学者尼古拉斯·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强调制度质量尤其是涉及资本市场的制度更为重要,它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绩效,影响了国家是否能够成功地融入全球化的金融体系^[21]。然而,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有学者认为尽管全球化没有削弱福利国家,也没有对解除全球市场管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却增加了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22]。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存在替代效应,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不同政治派别及其利益集团的争夺过程中,将会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23]。对于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印度、伊朗、泰国、马来西亚、阿根廷和巴西来说,它们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在这些国家中,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比较富裕。然而,即使在这些国家中,贫富差距也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左翼学者对这种全球化持有批判态度,他们认为现代全球社会出现的种种恶果如国家贫富分化、环境破坏和文化保存等风险与之相关。

发展中国家试图从全球贸易、金融和技术革新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然而,自二战以来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境地。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是万能的,可以解决全球化引起的所有问题。事实上,全球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摧毁了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恶化了这些国家的自然环境。发展中国家更依赖于全球投资流动,违约风险程度更高,面临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强大压力,因此更可能是全球“竞赛”(race to the bottom)的场所^{[24]116-140}。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和西方国家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对外脆弱性和依附性也越来越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计算,1980年最不发达国家人均GDP是287.63美元,2014年的人均GDP是931.24美元,大约增长了3.23倍;198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GDP是8880.03美元,2014年的人均GDP是38349.41亿美元,大约增长了4.31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随着全球投资的减少,流入非洲的资金也越来越少。这些国家普遍政局动荡,虚弱的国内治理阻碍其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发展中国家公共治理机构的腐败丛生、治理效率低下,无法为其民众提供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经济机会、环境监测、法律秩序和司法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更悲观的是一些“失败国家”,无法在现代世界中承担其民族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无法为其民众提供最重要的安全需求^[25]。然而,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和外国投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监管措施。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国际机构如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因而,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是由发达欧美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平衡仍然将长期存在。

5 结论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不平衡进程,这也决定了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前景。既然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以及一国内部的贫富分化等问题,那么为什么多数国家仍然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维护这一不稳定不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呢?为什么它们会倾向依赖于跨国公司和资本家呢?原因是,自我孤立与封闭于世界,把自己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国家将会陷入更为严重的发展困境。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国家要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如何参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和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的问题。全球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只有积极融入全球化才能从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红利。要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实

施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的投资。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积极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必由之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规则。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应该维持开放的贸易体系,建立有效的国内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以实现其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 [1] SACHS J. The end of poverty [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5.
- [2] 杨雪冬. 全球化: 已知的与未知的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5(2): 11-14.
- [3] WATERS M. Globaliz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4] SCHOLTE J.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5.
- [5]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M]. 梁光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6] DREHER A.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index of globalization [J]. Applied Economics, 2006(10): 1091-1110.
- [7] CLARK W. Environmental globalization [G] // NYE J and DONAHUE J, et al.,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 [8] NORRIS P.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smopolitan citizens [M] // NYE J and DONAHUE J, et al.,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 [9] The globalization index [J]. Foreign Policy, 2007(163): 68-76.
- [10] 约翰·伊肯伯里. 美国霸权的全球化 [G] // 戴维·赫尔德, 安东尼·麦克格鲁. 全球化理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1] 汪仕凯. 国家治理评估的指标设计与理论含义 [J]. 探索, 2016(3): 146-152.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简·斯图尔特. 解析全球化 [M]. 王艳莉,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14] GILL S and KEES P.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state forms [G] // Gill S. and JAMES M, et al., ed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5] 威廉·罗宾逊. 全球资本主义论 [M]. 高明秀,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6] 扬·彼埃特思. 分期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诸历史 [J]. 张广, 等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3(1): 9-21.
- [17] KEOHANE R, NYE J.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J]. Foreign Policy, 2000(8): 104-119.
- [18] 戴维·赫尔德.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 [M]. 杨雪冬,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19] 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斯·弗里德曼. 自由选择 [M]. 胡骑,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0] GRAY J.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M]. London: Granta, 1998.
- [21] 尼古拉斯·卡拉夫茨. 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历史透视 [J]. 王年咏, 等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6): 36-42.
- [22] POTRAFKE N. The evidence on globalization [J]. The World Economy, 2015(3): 509-552.
- [23] 张中元. 论全球化、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4): 136-155.
- [24] 莱纳·莫斯利.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G] // 戴维·赫尔德, 安东尼·麦克格鲁. 全球化理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5] ROTBERG R.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failure [J].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2(3): 83-96.

责任编辑: 蒋英州